

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活动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许 檀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商人会馆碑刻等资料,对清代中叶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考察显示:甘肃的晋商多来自晋中和晋南,主要分布于平阳、汾州等府和解州直隶州;陕商则主要来自西安、同州二府。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货主要有绸缎、布匹、茶叶、皮毛、杂货等,甘肃输入商品以绸缎、棉布、茶叶等为大宗,输出则为水烟、药材、皮毛制品等。乾隆年间汇聚兰州的山陕商号已有四五百家,武威更达六七百家,秦州和张掖则少得多。凉州府城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可能均超过省城兰州。

关键词:山陕商人 碑刻 兰州 武威 捐款

以往对甘肃商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清末民国,^①清代前中期的成果较少,^②这主要应是资料所限。不过,清代山陕商人在甘肃境内建有大量会馆,这些会馆的创建、重修都是商人集资而成,并多镌诸贞珉,从而为我们留下一批珍贵资料。^③本文主要利用这些碑刻,并参酌其他资料,对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活动进行考察。

一、山陕商人捐款碑所见之商人商号

清代各地商人在甘肃境内修建的会馆以山陕会馆数量最多。笔者先对清代前中期山陕会馆部分碑刻资料进行梳理,借以展现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规模及其经营活动。

(一)兰州山陕会馆碑所见之商号

兰州在明代属临洮府,隶陕西省。清代康熙六年(1667)分置甘肃省,八年定省会为兰州。乾隆

[作者简介] 许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兰州,730000。

① 主要参见向达之:《清末至民国前期的兰州商业》,《兰州学刊》1987年第4期;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刘进:《清末民国时期兰州城市商业近代化趋向述评》,《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渠占辉:《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羊毛出口贸易》,《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邵彦涛:《近代兰州区域市场中的客商概述》,《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李亚平:《客商“在地化”的概念、进程与其意义——以近代兰州客商为中心》,《兰州学刊》2014年第4期;樊如森:《清代民国时期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以茶叶贸易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渠瑞明:《近代甘宁青商路与市镇分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年;吕强:《清代甘肃商业市场发展及演变过程专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刘婷:《民国时期兰州水烟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

② 主要参见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中)》,《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吴琦:《从地方志书看清代的商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宋伦、田兵权:《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③ 关于甘肃山陕会馆的介绍,主要参见王俊霞、李刚:《论明清山陕会馆空间分布的经济依赖性——以甘肃、湖北、河南为例》,《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黎大祥、宋立彬:《武威会馆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田绿洲:《清代会宁的山陕会馆》,《发展》2016年第4期等。可惜这些研究未能对会馆碑刻资料进行细致的考察分析。

三年(1738)改临洮为兰州府,置皋兰为附郭县。^①清代各地商人在兰州所建会馆有山陕会馆、江西会馆、浙江会馆、陕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云贵会馆等,山陕会馆是其中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

兰州山陕会馆位于“山子石文昌宫后”。^②乾隆《皋兰县志》记有:山子石关帝庙为康熙四十七年所建。^③道光《皋兰县续志》则言,山子石“旧为明肃藩凝熙园,……乾隆四十年间以后山西、陕西商民即道士旧居修三官阁,药王庙、关帝庙为山陕会馆,正殿、陪殿、后殿之外,重楼叠阁;……殿门外为戏楼二,大门、牌楼一”。^④又据乾隆五十三年《关帝庙西偏重建楼殿碑记》记载,“前明肃藩废邸有遗址焉,怪石嵌空宛然岩壑,土人谓之山子石。后山陕士商于此□庙宇,记在各碑。其中关帝正庙栋宇恢宏,丹青炳焕,足妥神灵矣。东偏则有春秋阁、启圣祠以及重楼复道□□,独西偏楼殿倾颓,下堆瓦砾,甚非所以崇报祀、肃观瞻也。予塑望趋谒,谋及首事□□宪等,同请改建后楼、前殿,用以翼正庙而配东偏,意良美哉。于是募资,飭材鳩工□□竣。其后楼七楹,中奉真武,在(左)以祀药王,而右添祀火祖,其下则祀□□□三楹,专祀金龙四大王”。^⑤故山陕会馆当是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陆续扩建而成,其主要建筑有正殿、陪殿、后殿、春秋阁、启圣祠、三官阁、药王庙、戏楼、牌楼等。

山陕会馆的另一碑铭《□□□□王星相仙楼殿施银姓名碑记》,未见年款。据薛仰敬介绍,乾隆五十三年碑阴为“后续布施商号永顺当、富春号等名称”,以及购置木材、砖瓦、石灰等建筑材料和支付工价的开支明细,并列有“总理事人经理、募化人姓名近70人”;^⑥该碑所镌全部为捐款名号,其中的“丁联琇”是前述五十三年碑的书丹者,^⑦故该碑很可能是与乾隆五十三年碑同时所立的捐款碑。该碑所镌捐款名号计530余宗,其中可确认为商号者至少420余家,若加上最后三排(每排35宗)因字迹漫漶剥落无法确认者,商号数量可达500余家。^⑧该碑所镌山陕商号的捐款统计,请参见表1。

表1 《□□□□王星相仙楼殿施银姓名碑记》所镌山陕商号捐款统计

| 分 类 | 数量(家,人) | 捐款额(两) | |
|-----|-----------|--------------------|---------------------|
| 商号 | 10两以上 | 3 | 40.00 |
| | 6—8.6两 | 25 | 177.60 |
| | 4—5.8两 | 70 | 353.60 |
| | 2—3.9两 | 121 | 328.64 |
| | 1.28—1.9两 | 77 | 124.07 |
| | 1.28两以下 | 126 | 126.00 ¹ |
| | 合 计 | 422 | 1149.91 |
| 人 名 | 11 | 70.72 | |
| 不 详 | 105 | 52.50 ² | |
| 总 计 | 538 | 1273.13 | |

资料来源:据《□□□□王星相仙楼殿施银姓名碑记》统计。

注:1. 以平均每家1两计入。

2. $52.5 \text{ 两} = 0.5 \text{ 两/家} \times 3 \text{ 排} \times 35 \text{ 家/排}$ 。

① 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页。

② 道光《皋兰县续志》卷3《建置》,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第2页。

③ 乾隆《皋兰县志》卷10《祠祀》,乾隆四十三年刻本,第2页。

④ 道光《皋兰县续志》卷5《古迹·山子石》,第47—48页。

⑤ 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据该书第107页介绍,“原碑在山子石山陕会馆关帝庙前,今该地已为省粮食厅家属院,碑移兰州市博物馆保存。”

⑥ 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107页。

⑦ 乾隆五十三年碑记为:“浩授奉政大夫署甘肃兰州府事肃州直隶州知州诸城丁淮莹撰文,任联琇书丹”。

⑧ 据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108—110页所列捐款名号统计。

表1可见,参与此次捐款的商号数量虽然很多,但捐款金额都不太高,平均每家不过仅二两数钱;目前所见捐款最高的商号是东如店,为19.4两;^①超过10两的商号仅有3家。据薛仰敬记载,该碑所镌捐款共有17排,除前述第15—17排的百余宗捐款名号无法辨认之外,第12—14排也因字迹漫漶而未见捐款金额。因捐银1.28两的商号是在第11排的前半部(第304位),笔者估计第11排后半至14排每家的捐款金额应超过1两,暂以平均每家1两计入;而最后三排的捐款金额可能低于1两,若以平均0.5两计算,则捐款总额将近1300两。

《□□□□王星相仙楼殿施银姓名碑记》所镌捐款商号中,可区分经营行业者以金融字号最多,计有统裕当、恒兴当、晋魁当等当铺55家,共捐银291.8两;钱铺、钱号以及金铺各1家,共捐银4两零;若以捐款总额1300两计,金融业捐款占比达22.7%。其他可区分经营行业者还有:衣铺19家,合计捐银36.84两;绸铺11家,捐银27.3两;行店7家,共捐银25.84两;以及玉号、玉店、粮店、皮铺、染坊、碗铺、餐馆等。^②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原碑,^③无法做更加细致的分析。

(二)靖远县索桥堡《山陕修路碑》所见往来于黄河渡口的山陕商人

兰州城的山陕商号当以坐贾为多,靖远县索桥堡《山陕修路碑》则反映了行商的活动踪迹。该碑位于靖远县石门乡小口村黄河岸边的索桥渡口遗址,笔者于2019年9月曾前往考察。

靖远县明代为靖虏卫,清初改称靖远卫,雍正年间裁卫置县,属巩昌府,乾隆初改隶兰州府。^④索桥堡为黄河渡口,明代曾在此建铁索桥;由甘肃东部的平凉、宁夏等府前往河西走廊一带,不经兰州“而取道‘靖虏’以渡索桥者,路捷三日”,^⑤故山陕商人赴甘肃西部贸易者多取道索桥堡而达凉州、甘州、肃州。

《山陕修路碑》即乾隆四十三年《恭为大硕德胡公讳正宽平修船路功德碑序》,碑额为“山陕修路碑”。该碑记载了山陕商人集资整修黄河两岸道路的经过:

……晋商胡兄讳正宽公,宾商哈思十有八载,悯念索桥两岸途路不平,有意增修,奈工程浩大,难以枚举。于是岁之初夏……弟等于是纠合众客会馆公议,蒙众慨然诺许,情愿□施□善果。爰有字号不拘大小,共成一百七十家有馀;捐银无论多少,总积三百四十两;不足陆续稍奉,以完功德。……不数月而工程告竣。

实际参与此次集资的商人商号共计204家,^⑥捐银342.91两。其中晋商101家,捐款187.95两,占总额的54.8%;陕商89家,捐银127.66两,占37.2%;甘肃商号14家,捐银27.3两,占比8.0%。特别难得的是,该碑标注了每一商人商号的籍贯,我们可借以了解其来源。《山陕修路碑》所镌捐款商号的地域分布及其捐款统计,请参见表2。

表2 乾隆《山陕修路碑》所镌捐款商号的地域分布及其捐款统计

| 地域 | 商人商号 | 捐款额(两) | 所占比例(%) | 分布州县 | |
|----|------|--------|---------|------|-------------------|
| 山西 | 平阳府 | 54 | 94.75 | 27.6 | 曲沃、襄陵、太平、临汾、浮山、翼城 |
| | 汾州府 | 20 | 38.00 | 11.1 | 介休、汾阳 |
| | 太原府 | 6 | 9.80 | 2.9 | 太原、徐沟、祁县、阳曲 |
| | 解州 | 15 | 27.70 | 8.1 | 夏县 |
| | 绛州 | 5 | 16.50 | 4.8 | 绛县、闻喜 |
| | 潞安府 | 1 | 1.20 | 0.3 | 屯留县 |
| 合计 | 101 | 187.95 | 54.8 | | |

① 该碑排在首位的捐款者及其金额字迹不清,排在第二的张文宪捐银20两;东如店捐银19.4两,是商号中捐款最多者。

② 据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108—110页所列捐款名号统计。

③ 据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111页记载,该碑为“兰州市博物馆收藏”。笔者曾前往博物馆查询,据说碑铭已经移至碑林,但在碑林也未能找到。

④ 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第458、453页。

⑤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278页。

⑥ 此系累计数,与碑文所记略有不同。

续表 2

| 地域 | | 商人商号 | 捐款额(两) | 所占比例(%) | 分布州县 |
|----|-----|------|--------|---------|-------------------------|
| 陕西 | 西安府 | 47 | 80.56 | 23.5 | 咸宁、长安、三原、富平、渭南、泾阳、醴泉、乾县 |
| | 同州府 | 40 | 44.70 | 13.0 | 蒲城、朝邑、华州、华阴 |
| | 其他 | 2 | 2.40 | 0.7 | |
| | 合计 | 89 | 127.66 | 37.2 | |
| 甘肃 | 凉州府 | 14 | 27.30 | 8.0 | 武威、镇番、永昌 |
| 总计 | | 204 | 342.91 | 100.0 | |

资料来源:据乾隆四十三年《山陕修路碑》统计。

表 2 可见,参与此次集资的商人商号分布于山、陕、甘三省的七府二直隶州的 30 多个州县。其中,晋商来自山西平阳、汾州、太原、潞安四府及解、绛二直隶州,尤以平阳府最多,占晋商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潞安府只有屯留县的一家;陕西商人主要来自西安、同州二府,甘肃商人多来自凉州府。《山陕修路碑》的落款为“凉城山陕合郡众字号”,故捐款商人大多应在凉州府城武威设有店铺。

(三)武威陕西会馆碑所见之陕商名号

武威位于甘肃中部,明代为凉州卫,雍正二年(1724)裁卫设府,置武威为凉州府之附郭县。^①清代山陕二省商人在武威城内均建有会馆。山西会馆目前未见碑刻存留;陕西会馆则保存有 7 通碑铭,^②乾隆四十六年《创修陕西会馆碑》记述了会馆的创修经过,但碑文漫漶难以识读,不过该碑碑阴绘有会馆建筑图,并有简短说明:“创修陕西会馆,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凭中杨大仁等说合,用正价纹银一千四百两……置买董姓衙署一处”。结合其他几通碑铭,我们可大致了解陕西会馆的创修经过:其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买地,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之间陆续集资修建,至四十六年竣工,嘉庆末年曾进行重修。

乾隆三十八年《创修陕西会馆首事督工捐施银两碑》是该会馆最早的一通捐款碑,有 30 家“首事督工”参与集资,共捐银 2600 余两。其中捐款最多者是同州府朝邑县大顺张号,为 175 两;捐银超过 100 两者共有 12 家。^③乾隆四十六年的三通捐款碑则反映了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会馆的持续集资过程,计有 340 余家商人商号参与捐款,共捐银 6540 余两。这三碑所镌商人商号的地域分布统计,^④请参见表 3。再加上乾隆三十八年“首事督工”的捐款,创修会馆的集资总计为 9200 余两。

表 3 可见,陕西商号主要来自西安、同州二府,而以西安府属商号实力最强。甘肃也有 20 余家商号参与集资,捐款 930 余两,占全部捐款的 14%;这些商号很可能也是陕西商人或其后裔所开设,清代前期已有不少山陕移民在甘肃入籍。^⑤表 3 的捐款金额显示,340 余家商号捐银 6540 余两,平均每家 19.1 两,与兰州山陕会馆集资中捐款最多的东如店已相差无几;武威的山陕商人不仅“首事督工”的捐款额远高于兰州,即便一般商号的经济实力亦属可观。看来武威的商号规模可能比兰州要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应以批发转运贸易为主。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创建陕西会馆的捐款商号中至少有三四十家与前述索桥堡《山陕修路碑》中的商号名称、籍贯完全一致,如咸宁县永盛合、永盛傅、永盛恒、合盛川、信德恒、世兴德、如松合,同州府蒲城县隆泰魁、义兴隆、三益店、恒顺店,以及朝邑县大顺张、

① 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第 457 页。

② 这七通碑铭为:乾隆三十八年《创修陕西会馆首事督工捐施银两碑》、乾隆四十六年《创修陕西会馆碑》以及三通捐款碑、乾隆五十七年《陕西会馆捐助香灯银两字姓名碑记》、嘉庆二十五年《重绘陕西会馆新建卷棚看台土主神祠钟鼓二楼碑亭园亭题名功德碑记》。以上均存武威县大云寺,系兰州大学博士生李鸿于 2020 年 5—7 月帮助拍摄,附笔致谢。

③ 详情请参见许檀:《乾隆年间活跃在武威的山陕商人》,待刊稿。

④ 乾隆三十八年碑的“首事督工”商号有不少再次捐款,为避免重复,这 30 家未予计入。

⑤ 乾隆《武威县志》不分卷《地里志·户口》(乾隆十四年刻本,第 16 页)记有:“前代寇掠频仍,屢为凋敝,尝徙他处户口以实之,山陕客此者恒为家焉。”道光《敦煌县志》卷 7《风俗》(道光十一年刻本,第 3 页)记载:“商贾,先自山西陕西贸易至此,近亦渐入土著,置田起屋,均列民户。”

顺兴王、大亨穆等。这恰好验证了笔者此前的估计：在索桥堡参与修路的商人商号大多在武威城设有店铺；换言之，武威较大的商号大多会有伙计赴内地采购商货，往返奔波于甘肃和内地各省之间。

表 3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创建陕西会馆捐款商人的地域分布统计

| 地 域 | | 商人商号 | 捐款额(两) | 所占比例(%) | 分布州县 |
|-----|-----|------|---------|---------|---------------------------|
| 陕西 | 西安府 | 120 | 3217.66 | 49.2 | 咸宁、三原、富平、长安、泾阳、渭南、礼泉、临潼等县 |
| | 同州府 | 130 | 1859.84 | 28.4 | 蒲城、朝邑、韩城、郃阳、大荔、华州、华阴等州县 |
| | 汉中府 | 6 | 98.40 | 1.5 | 均为南郑县 |
| | 合计 | 256 | 5175.90 | 79.1 | |
| 甘肃 | 凉州府 | 12 | 374.30 | 5.7 | 武威、镇番、永昌 |
| | 秦州 | 3 | 398.30 | 6.1 | |
| | 庆阳府 | 3 | 138.50 | 2.1 | 宁州、固城镇 |
| | 其他 | 4 | 19.40 | 0.3 | 张掖、靖远、成县、陇西 |
| | 合计 | 22 | 930.50 | 14.2 | |
| 不 详 | | 64 | 440.50 | 6.7 | |
| 总 计 | | 342 | 6546.90 | 100.0 | |

资料来源：据武威陕西会馆乾隆四十六年的三通捐款碑统计。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看到，乾隆年间武威仅有名号可考的陕西商号已有 300 余家；山西会馆的面积大于陕西会馆，^①晋商数量当更多于陕商；在前述索桥堡《山陕修路碑》中我们也看到参与集资的晋商数量和捐款额都超过陕商，这些晋商大多应在武威设有店铺。又据《武威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武威有当铺 274 座，征收当税银 1370 两，^②其金融业之发达即便在内地亦属可观；典当业是山西商人的强项，这些当铺主要应是由晋商经营的。故笔者估计乾隆年间汇聚在武威的山陕商人合计可达六七百家。^③ 武威的腹地范围也超过兰州，据乾隆《武威县志》记载，“（黄）河以西之商贾凉庄为大，往者捷买资甘、肃，今更运诸安西、沙、瓜等，以利塞外民用，所赖以通泉货者重矣”，^④即武威商货的转销范围不仅可达甘州（张掖）、肃州（今酒泉），还远及安西州乃至新疆。

（四）张掖晋商会馆碑所见之山西商人

张掖位于武威以西 450 里，明代为甘州卫，雍正初年裁卫设府，置张掖为甘州府之附郭县。^⑤ 张掖的山西会馆始建于雍正初年，“乾嘉、道咸、同光”年间均有重修。^⑥ 遗憾的是，笔者在张掖考察时未能找到会馆创建和早期的重修碑铭，目前所见最早的重修碑是光绪九年（1883）的。该碑记载：“我甘州市南旧有山西会馆，……其由小而大，由朴而华，经营奚止一次”；同治十年（1871）因失火至“[正]殿、陪殿、禅堂、僧寮胥为焦土”，遂集资重修，至光绪五年竣工。此次重修，共用银 2579.2 两，钱 3060 余串文，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1）山西会馆原存银 420 两；（2）利息钱 607 串文；（3）“吏部侯铨县丞赵起元”所捐房产一所，变价 1200 串文；（4）50 余家商人商号集资，共捐银 1740 余两，钱 970 余串。不过因“兵燹甫毕，贾利维艰”，其筹资不敷修建所需，“不得不借同乡之筹作他山之助”，并得到凉州府城武威的山陕商人鼎力相助：除凉州山陕会馆助银 290 两外，还有 30 余家凉州商号参与集

① 黎大祥、宋立彬：《武威会馆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6 期。

② 乾隆《武威县志》不分卷《地里志·杂税》，第 18 页。兰州府治皋兰县的当税银只有 660 两，参见道光《兰州府志》卷 5《田赋志·杂税》，道光十一年刻本，第 27 页。

③ 关于武威的商业规模，详情请参见许檀：《乾隆年间活跃在武威的山陕商人》，待刊稿。

④ 乾隆《武威县志》不分卷《风俗志》，第 32 页。

⑤ 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第 457 页。

⑥ 民国八年（1919）《重修山西会馆碑记》，碑存张掖市大佛寺，笔者于 2019 年 9 月考察时拍摄。

资,共捐银 140 余两,钱 132 串,合计占重修经费的 10.5%。^①同光之际张掖重修山西会馆的经费来源统计,请参见表 4。

表 4 同光之际张掖重修山西会馆的经费来源统计

| 地域 | 分类 | 参与集资者 | 捐银(两) | 捐钱(串文) | 合计(两) | 所占比例(%) |
|----|--------|-------|--------|--------|--------|---------|
| 张掖 | 商号 | 51 家 | 1770.0 | 1187.0 | 4529.2 | 89.5 |
| | 个人 | 9 人 | 2.0 | 36.5 | | |
| | 官员 | 6 人 | 6.0 | 0 | | |
| | 山西会馆存银 | | 420.0 | 0 | | |
| | 捐赠房产变价 | | 0 | 1200.0 | | |
| | 利息收入 | | 0 | 607.0 | | |
| | 合计 | | 2198.0 | 3030.5 | | |
| 凉州 | 商号 | 32 家 | 141.2 | 132.0 | 532.7 | 10.5 |
| | 山陕会馆 | | 290.0 | 0 | | |
| | 合计 | | 431.2 | 132.0 | | |
| 总计 | | | 2629.2 | 3162.5 | 5061.9 | 100.0 |

资料来源:据光绪九年重修山西会馆碑文统计。

说明:以 1.3 串文 = 1 两折算。

表 4 可见,同光之际重修会馆时参与集资的张掖商号只有 50 余家,乾嘉年间其数量可能更少;而张掖陕西会馆的创建则晚至“民国元年兴工”,至民国四年告竣。^②显然张掖的商业规模远逊于武威,且张掖实力较强的商号很多在武威也设有商铺,它们很可能是武威商铺的分号或联号。将张掖的捐款商号与武威的捐助商号相对比,至少有 11 家名称相同,其具体名称以及捐款示例,请参见表 5。

表 5 同光之际在张掖和武威均开设店铺的商号名称及其捐款示例

| 商号名称 | 张掖捐款额 | 武威捐款额 |
|------|-----------------|--------|
| 世兴赵 | 房屋变价 1200 串文 | 不详 |
| 天成亨 | 银 120 两,钱 90 串文 | 银 12 两 |
| 协同庆 | 银 100 两,钱 70 串文 | 银 12 两 |
| 万盛兴 | 银 80 两,钱 80 串文 | 银 6 两 |
| 立盛明 | 银 60 两,钱 70 串文 | 银 6 两 |
| 福顺西 | 银 60 两,钱 70 串文 | 银 6 两 |
| 义和长 | 银 60 两,钱 60 串文 | 银 6 两 |
| 协庆义 | 银 60 两,钱 40 串文 | 银 6 两 |
| 永盛昌 | 银 60 两,钱 50 串文 | 银 6 两 |
| 义兴隆 | 银 60 两,钱 5 串文 | 银 6 两 |
| 天一德 | 银 30 两,钱 5 串文 | 银 6 两 |

资料来源:据光绪九年重修山西会馆碑文统计。

表 5 中,天成亨和协同庆均为山西平遥票号,天成亨是乾隆年间介休侯氏在平遥开设的布庄,道光六年改为票号,为著名的“蔚字五联号”之一;协同庆设于咸丰六年(1856),这两家票号在全国主要商业城市天津、上海、苏杭、汉口、西安、三原,以及甘肃的兰州、凉州、甘州均设有分号。^③世兴赵则是前述“吏部侯铨县丞赵起元”开设的,光绪九年重修山西会馆碑的碑文记载“甘郡有赵君起元者,古晋

^① 光绪九年重修山西会馆碑共三通,均无碑名,碑存张掖市大佛寺,笔者于 2019 年 9 月考察时拍摄。三碑年款均为“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夷则月上浣谷旦”。其一记载重修缘起和经过,碑阴开列有支出明细;其二开列捐款官员商人名号,碑阴为经理、监工人姓名;其三记述“吏部侯铨县丞赵起元”捐献房产,“以垫公用”。稍觉遗憾的是,三碑下部均有少量残损漫漶。

^② 民国五年陕西会馆碑,碑存张掖市大佛寺,笔者于 2019 年 9 月考察时拍摄。

^③ 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0—141、146—147 页。

人也,随乃父贸易斯土开设世兴赵”；而“凉州世兴赵”亦有捐款,可惜金额部分漫漶不清。

(五) 秦州会馆碑所见之山西商人

秦州(今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明代为巩昌府所辖,隶陕西省;康熙初改属甘肃,雍正六年升为直隶州。^① 秦州的山陕会馆也是山西、陕西商人分别修建的,两馆相邻。其中,山西会馆落成于乾隆十四年,《创建山西会馆碑记》记载:

陕省中之肇牵服贾者晋人居多,其敬王者亦晋人为至。雍正初,晋人韩巨显、赵□□、崔枢商于陕西之秦州,每当王诞辰或成神日,奉香币,具牲醴,或于中衢缚木为歌台,觅梨园子弟奏乐其上,以为神欢,意甚虔也。然或彼或此,迄无定所,□□时以为憾。爰于雍正六年纠集晋人之同商于秦者共二十余人,随其多寡,输赏财□三十余金,贷于人以取其息,三人者为之经营焉。至雍正末年,通计子母□数倍之,而三人者且归矣,因举此六十余金转托于同乡之秦瑄、辛大鹏、张华、韩弘烈四人者为之经营焉,四人者转出货以收其息。又至乾隆十年,通计子母得二百五十余金,……然欲为创建神庙之费犹不及什之四五也。……再约同伴之田王相、王士魁、柴方□、田民安、裴铨、乔□高,□募于同乡之为商者,得五百余金,合前所为二百余金,可以举事矣。乃于乾隆□年九月十五日,同会福寺住持僧赵□□、师弟范□义,于本寺之东地基一所,南北长一十四丈,东西阔四十九尺,中为正殿三楹,殿之前拜亭三楹,□建□□楼三楹,山门一楹,□内南北僧房各三楹,殿之后侧厨房三楹。原住持经管晨夕供香,□勤洒扫,守门庭焉;又置常住地四十亩,大小十一段,以为住持之□廉。是举也,其输赏则晋人之商于秦者咸有份也;其创始以及落成经二十余年,首事者韩巨显等三人,继事者秦瑄等四人,又继为觅钱以相厥事者田王相等六人皆不可无记也。勒诸石以告晋人之为商者,顾念前人经营之艰,尚守此成劳,益加丹雘之供,致敬神之忱,则善矣。^②

据碑文记载,秦州山西会馆于雍正六年开始集资,至乾隆十四年落成,前后历经 20 余年,显然此时晋商的实力尚属有限。据该碑所附“原日老会布施”名录,最初的倡捐者韩巨显为太平县人,继任的秦瑄为曲沃县人,张华为孝义县人,田王相是介休县人;该碑所列创建捐资者共 25 人,主要来自山西汾阳府的介休、孝义、汾阳,平阳府的曲沃、太平、翼城等县,还有太原府和蒲州商人。^③

嘉庆八年(1803)因“贸易秦地者较前”增多,祭祀之际“拜亭不克以容众”,故会馆进行了扩建,碑文记言:

从来春祈秋报用昭神庥,而散福享祭均沾圣惠。如我□□东会馆自创建以后,或逢神会而奉□,以□□圣诞而献优散福享祭,会属齐集于拜亭。乃于近年以来蒙圣默佑,而贸易秦地者较前颇见其多,每当神会之余而散福享祭,拜亭不克以容众。因于嘉庆七年九月会期,凡我会馆内之人感□兴议,即从拜亭之前梓修数□,于八年二月内起工,九月内遂而落成。^④

此次扩建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计有 110 余家,共捐银 320 余两。较之雍正年间“晋人之同商于秦者”只有 20 余人,晋商人数和经济实力均有较大增长。

秦州的陕西会馆创建较晚,据说是在民国年间。不过陕西与秦州相邻,陕商在秦州贸易应不会晚于晋商;且距离秦州城仅数十里的麦积镇街亭村(今属天水市麦积区)的山陕会馆为康熙四十三年创建,乾隆、道光年间重修,^⑤故笔者估计清代前期活跃于秦州的陕西商人当也有一定规模。

此外,清代前中期甘肃各地所建山陕会馆还有不少,简要列于表 6。

① 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第 455 页。

② 天水市博物馆藏乾隆十四年《创建山西会馆碑记》拓片,系兰州大学博士生李鸿 2020 年 7 月考察时收集,附笔致谢。

③ 乾隆十四年《创建山西会馆碑记》,天水市博物馆藏拓片。

④ 嘉庆八年《□修拜亭碑记》,碑存天水市秦城区山陕会馆,系兰州大学博士生李鸿 2020 年 7 月拍摄。

⑤ 未见年款《陕西客商重修会馆碑记》、乾隆三十四年《重修会馆山西碑》、道光十三年《重修会馆韩城碑记》,参见汪明校注:《麦积区金石校注》,三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7、127、171 页。

表6 清代前中期山陕商人在甘肃所建部分会馆

| 地点 | 会馆名称 | 创建时间 | 资料来源 |
|--------------|------|-----------|--|
| 兰州 | 山陕会馆 | 康熙后期—乾隆年间 | 乾隆五十三年《关帝庙西偏重建楼殿碑记》，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106页 |
| 金县(今榆中) | 山陕庙 | 道光二十四年之前 | 道光《金县志》卷5《祠祀志》，道光二十四年刻本，第3页 |
| 狄道州 | 关帝庙 | 乾隆二十三年改建 | 乾隆《狄道州志》卷5《祠祀》，乾隆二十八年刻本，第3—4页 |
| 安定县(今定西县) | 山陕会馆 | 雍正八年 | 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甘肃卷》 |
| 会宁县 | 山陕会馆 | 乾隆三十年 | 田绿洲：《清代会宁的山陕会馆》，《发展》2016年第4期 |
| 通渭县马营监 | 山陕会馆 | 嘉庆中叶之前 | 嘉庆十九年《续修山陕会馆碑》，碑存通渭县马营镇碑林 |
| 平番县红城镇 | 山陕会馆 | 乾隆二十一年 | 会馆内“红城历史文化展”之“大殿原貌” |
| 武威 | 陕西会馆 | 乾隆四十六年 | 乾隆四十六年《创修陕西会馆碑》 |
| | 山西会馆 | 不详 | |
| 张掖 | 山西会馆 | 雍正二年 | 光绪九年重修山西会馆碑 |
| 秦州(今天水市) | 山西会馆 | 乾隆十四年 | 乾隆十四年《创建山西会馆碑记》 |
| 麦积镇(今天水市麦积区) | 陕西会馆 | 康熙四十三年 | 未见年款之《陕西客商重修会馆碑记》，汪明校注：《麦积区金石校注》，第227页 |
| 康县窑坪村 | 关帝庙 | 乾隆末年 | 乾隆癸丑(?)年《关帝碑》，碑存康县窑坪村关帝庙 |

二、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主要商品

山陕商人由内地贩货赴甘肃贸易，主要有三条线路，均须经由陕西。其一，由河南洛阳经澠池、陕西至阆乡县过潼关入陕西，经华州、渭南、西安、咸阳、礼泉、邠州入甘肃境，经泾州至平凉府，由平凉府向北经固原可达宁夏府；^①由平凉府向西经隆德、安定抵兰州，再西行可达西宁府；不过销往河西走廊一带的商货大多不经兰州，而是由平凉府直接西行至靖远之索桥堡渡黄河，至凉州、甘州、肃州、新疆一线，比绕行兰州可节省三天路程。^②其二，从河南阆乡县过黄河入陕西境，经咸阳、岐山、陇州入甘肃，经清水县至秦州，再西行经巩昌府抵兰州。^③山陕商人从河南贩货赴甘肃，多由潼关入陕西，走以上两条路线。其三，从湖北贩货赴甘肃，可溯汉水至陕西汉中府，经略阳入甘肃境，经西和、礼县、宁远、巩昌府至兰州；^④也有一部分商货溯汉水至樊城转丹江北上，经鄂豫陕三省交界之荆子关至陕西商州之龙驹寨，然后陆运至西安或泾阳，再转运甘省。乾隆四十三年山西曲沃商人柴安国等从江西景德镇购买了140余桶磁器，拟运往叶尔羌出售，走的就是这条路；^⑤咸丰年间晋商义成店从湖北运布至甘肃发卖，也走的这条路。

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绸缎、布匹、磁器、茶叶、皮毛、药材、杂货等。

乾隆四十三年“高朴私鬻玉石案”中涉案的甘肃山陕商人如：山西右玉县张釜“向在甘肃经营”，“往来苏州置买绸缎等物赴甘售卖”；曲沃县卫全义“乾隆三十五年始到苏州，与甘肃人魏佳士合伙置买绸缎、杂货赴甘售卖”；乔云焕“先在甘肃兰州杂货铺生理，与卫全义交好，因闻卫全义在苏州做玉器发财”，遂参与了贩玉。又如：山西太平县李尚贤“与赵爰在肃州绸缎杂货店内同伙”；夏县樊迎吉“与樊天富等在肃州杂货铺生理”；永宁州牛四“常在肃州做皮货生意”；陕西蒲城县王洪绪“向在肃州

① 檐漪子辑：《天下路程图引》卷2《北京由河南府至陕西陆路》《陕西省城由邠州至宁夏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89、493页。

② 梁份：《秦边纪略》，第277页。

③ 檐漪子辑：《天下路程图引》卷2《陕西由凤翔府至临洮府路》，第490—491页。

④ 檐漪子辑：《天下路程图引》卷2《巩昌府由沔县至襄阳府路》，第494页。

⑤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605—606页。

日新店开张杂货生理,领凉州陈成章、泾阳何兴邦本钱行运四五年”;陕商师四在“凉州府开磁器铺”;等等。此案涉及的诸多“到苏贩卖玉料之人并非专卖玉料,俱系来往甘肃肃州及阿克素、叶尔羌等处贩卖绸缎、杂货,私行夹带玉块赴苏售卖”,而绸缎、杂货乃是他们贩往甘肃、新疆的最主要商货。^①

绸缎、布匹是甘肃输入的大宗商品。绸缎主要产自江浙,经汉口、洛阳、西安等地转运甘肃。乾隆年间汉口市场上的绸缎品种有宁绸、宫绸、庄绫、汴绫、沈绸、纺绸、绵绉、湖绉、大绢、丝布、贡缎、洋缎、羽毛缎、广缎,以及各种朝衣、蟒袍、补褂、霞披、摆带、荷包、帕头、锦绣、屏幢、围席、椅垫等,^②这些商品主要来自苏杭、湖州、南京,惟汴绫出自开封,广缎、洋缎来自广东。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旅行日记中记述了咸同年回民起义之前西安与陕甘直至土耳其斯坦的贸易状况:“主要的贸易品是苏州的丝绸,湖北、湖南等地的茶叶,还有糖,西安府是这些商品的堆货场。你在这里问西安府与哪里有贸易联系,得到的回答首先是苏州和杭州,其次是汉口。去那里很便宜,因为只要5天的陆地行程先到龙驹寨,再从那里走水路即可到达。西安府这里平时汇集了来自东南各省(包括广东),也有来自十分富饶的汉中府和来自四川的商品,然后从这里把商品运往陕西和整个西部各地。”^③在乾隆年间洛阳创建潞泽会馆的集资中,有绸布商46家参与集资,共捐银27000余两,占集资总额的74%。^④

兰州、秦州城内都有山陕商人开设的绸铺,兰州城内还设有绸缎行。^⑤乾隆五十三年兰州山陕会馆碑的捐款商号中有乾盛、新升等绸铺11家,另有裕合、裕源等衣铺19家,可能也经营绸缎制品。嘉庆年间秦州城内有晋商开设的三益、复新等绸铺10家。山陕商人在兰州、秦州开设的绸铺及其捐款示例,请参见表7。

表7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兰州、秦州开设的绸铺字号及其捐款示例

| 兰州山陕商号 | 捐款额(两) | 秦州晋商字号 | 捐款额(两) |
|--------|--------|--------|--------|
| 乾盛绸铺 | 8.0 | 三益绸 | 12.0 |
| 新升绸铺 | 3.9 | 复新绸 | 10.0 |
| 义茂绸铺 | 3.6 | 顺泰绸 | 10.0 |
| 魁丰绸铺 | 2.8 | □庆绸 | 8.0 |
| 统盛绸铺 | 2.4 | 聚成绸 | 8.0 |
| 祥泰绸铺 | 1.6 | 永兴绸 | 7.0 |
| 元顺绸铺 | 1.0 | 恒茂绸 | 4.0 |
| 永成绸铺 | 1.0 | 长盛绸 | 4.0 |
| 广盛绸铺 | 1.0 | 庆□绸 | 2.4 |
| 和顺绸铺 | 1.0 | 聚盛绸 | 2.4 |
| 永兴绸铺 | 1.0 | | |
| 合计 | 27.3 | | 67.8 |

资料来源:据兰州山陕会馆乾隆五十三年《□□□□王星相仙楼殿施银姓名碑记》和秦州山西会馆嘉庆八年《□修拜亭碑记》统计。

棉布主要来自湖北、河南。湖北的汉阳、德安、安陆、黄州等府都是棉布产区。据载,汉阳棉布“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⑥德安府云梦县是湖北棉布销行西北的重要转运站,“凡西客来楚织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若不经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霉黯”,故晋商多在云梦开设店号,县城内“宽间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⑦咸丰年间晋商义成店在湖北采购棉布的地点有:汉阳府汉口镇,安陆府旧口镇、石碑镇、多宝湾,蜻蚌湖镇,德安府唐县镇、长江坡,黄州府新

①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2册,第645页;第3册,第372—373、367、380、466、470—471、534、600页。

②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1《食货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③ 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王彦会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4页。

④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⑤ 道光二十三年《重修白衣寺塔院碑记》,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173—174页。

⑥ 乾隆《汉阳县志》卷10《物产》,乾隆十三年刻本,第1页。

⑦ 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舆地·风俗》,道光二十年刻本,第22页。

洲镇,荆州府沙市镇、沙洋镇、后港镇,等等。^①该字号在湖北采办的棉布中有不少溯汉水至樊城,然后转丹江水道至荆子关入陕西,再经龙驹寨、泾阳转运甘肃。如从黄州府新洲镇采办的“骑龙布”先从新洲发汉口,“每载杂使、水脚钱四千八九至五千之谱”;汉口发樊城,“每载水脚纹银三两二”;樊城发荆子关,“每载水脚纹银三两四”;以上为水运,折合每匹“水脚纹银四厘六毫”。由荆子关至龙驹寨改陆运,“一应脚费、小力每匹摊干银六厘六”;由龙驹寨至泾阳,“大谱每百斤脚元银一两三”;从泾阳至甘肃灵州,每匹“脚费足纹银一分二厘”。自汉口至灵州,总计“脚、税、店用干银三分四三”,外加灵州布店用钱;“发宁夏城内出售,迭本与至灵州等”。《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将上述路程、脚费汇总为顺口溜:“骑布汉发荆紫关,四厘六毫水脚摊;关上发寨六厘六,一厘一毫到泾阳;泾发灵州一分二,再加灵用五厘三;发宁亦有脚税用,较灵多加一厘商。由汉发至宁夏地,每匹脚费四分摊。”^②即从汉口至甘肃灵州和宁夏府城,每匹棉布的运费大约需银四分。同治四年绛州日兴盛布店的信稿记有:从陕西三原到甘肃秦州的路程共计865里,“其布进城(笔者注:指秦州),每担入境担头银四分,每卷捐助银二钱,每担店底银一钱二分;若在秦城卖,每银一两厘金银二分,店用银三分。若发兰省,每担店过载银一钱,每担兰帮担头银三钱,每担官柜钱一百一十文,协柜钱四十文,槽柜钱二十文,出境厘金银四分,出境担头银一两五。以上俱系旧规,惟入境每卷二钱捐助从今九月初一日起”。^③

河南的棉布产区也很多,同治年间晋商庆余堂号在河南采购棉布的地点有孟津、孟县、洛阳、偃师、禹州、临颖、郟县,以及河南府之白沙、高龙、彭婆等镇,洛阳县之铁谢、李村、回郭等镇,许州之五女店、石固镇、张潘镇、小商桥,襄城县茨沟镇等。棉布由许州五女店发凉州,途径潼关、泾阳、长武入甘肃,“由五女[店]发凉州,脚银许梭八甬成捆,五捆作一担;每担至潼关脚元银一两三”;“潼关至泾阳,每担脚银二钱”;泾阳发凉州,“每担脚元银一两五”,其间在靖远过黄河,“哈思[堡]河税银每担车银八分,它[驼]脚银七分”,“进凉城每担上税银二钱七八五”。^④上引义成店、日兴盛、庆余堂等商号的文书信稿虽是咸同年间的,但其所记商道与前引之明末清初商书《天下路程图引》完全一致,乃是各地商人在数百年的贸易过程中形成的。

棉花也是甘肃输入的较大宗商品,主要来自河南、湖北。李希霍芬于1870年记载了河南棉花的西运路线:出洛阳城西门,“沿黄河南岸前进700里,到达黄河大拐弯处的要塞潼关,由那里再转运西安府、兰州府和中亚地区。河南自己出产的货物主要是棉花,卖掉棉花的钱再购买其他所需”。洛阳“平均每天的棉花交易额高达约合两万塔勒硬币,其中最大一部分卖给陕西和甘肃”。^⑤西安府咸阳县则是陕西重要的棉花转运市场,其棉花“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运载殆无虚日”。^⑥

茶叶是专卖商品,清初沿明制以茶易马。甘肃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共茶引27296道,每引一道办官茶五篋、商茶五篋,官茶、商茶各占50%。甘肃的茶多来自湖南,“茶篋先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至巩昌,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茶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⑦乾隆中叶西北平定,清政府“罢中马之制”,改以每茶十封“一封交茶,九封折银”,^⑧即商茶占比增至90%;以茶引27296道计,商茶数量达245万余斤。陕西泾阳是西北茶叶贸易的总汇之区,既是茶叶的加工中心,也是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从湖南运来的散茶经加工炒制,制成砖茶

① 《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6—90页。该《规程》第13页中缝处原有“义成店”朱印(可惜在出版时被删除),应即该字号的“规程”。

② 《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67—71页。

③ 《同治四年绛州日兴盛布店各地往来信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册,第238—240页。

④ 《同治十年庆余堂各处办布底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113—118页。

⑤ 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351页。又,1塔勒硬币大约相当于白银1两,参见同书第382页。

⑥ 《创建花商会馆碑记》,转引自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3页。

⑦ 乾隆《甘肃通志》卷19《茶马》,乾隆元年刻本,第1、3页。

⑧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2《茶法》,宣统元年(1909)刻本,第3页。

再销往甘肃、青海等地。^①《秦疆治略·泾阳县》记有：“官茶进关运至[泾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②《清史稿》记有“甘商旧分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③当有不少山陕商人参与茶叶贸易。

水烟、皮毛制品、药材等是甘肃输出的主要商货，当也有山陕商人参与经营。

水烟，为甘肃特产。嘉庆间王沂《青烟录》记言：“水烟者，起于甘肃之兰州。兰州五泉山下产烟草，既制，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后吐，醉人尤易”；而“初时人畏其力猛，食者绝少，渐自秦而晋，而豫，而齐鲁燕宋，大江以南，今且遍天下无不至矣”。^④道光《皋兰县续志》记载：“五泉山水清土沃，性宜种水烟”；一条城“地势平衍，土口沃膏，林木森郁，多种水烟、木棉花，商贾贸易，市廛鳞列”。^⑤道光十一年，皋兰、金县乡绅顾名、张锦芳、刘世保等倡捐，集资 3000 余千文创建青城书院，并议定“合邑商民每年出境买烟担货物，每担捐银一分，以作束修膏火之资”。^⑥水烟也是秦州土产之大宗，州志记载：“货则……蜜、蜡、漆三者为多，其最多者烟草”“土所出货，水烟遍行楚蜀吴越闽广，次则药材”。^⑦1872 年李希霍芬在宝鸡附近的渭河边“遇到了成群结队驮着甘肃（自兰州府）产的水烟的牲口，烟装在盒子里，跟茶一样，显然是一种珍贵、重要的贸易品”。^⑧

皮毛制品也是甘肃输出的重要商品，如《庆阳府志》货属列有毡、绒、絨、羊毛等，皮类有羊皮、狐皮、牛皮、虎皮、鹿皮、狼皮；^⑨兰州府“货之属”有“褐、绒、毡、皮、革、胶、毛”等；^⑩镇番县“狼、狐、土豹、獾猪、猓猓孙”等“皆利其皮毛”。^⑪《靖远县志》记载：“此地擅畜牧者百千为群，或至数千几万者；绒、毳、皮为毡、为裘、为褐，为罽、为氍、为毼毼之属，其利亦溥。”^⑫此外，新疆所产皮毛也多经由甘肃输入内地，如乾隆八年准噶尔部带到肃州贸易的皮张有 20 余万，其中狐皮 9.3 万余张，银鼠皮 6 万余张，羊皮 4 万余张，其他还有貂皮、豹皮、狼皮、猓猓孙等。^⑬陕西泾阳是西北皮毛的加工和转运中心，“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并“借泾水以熟皮张”。^⑭甘肃、新疆所产皮毛大多汇集到泾阳进行加工，然后销往各地。^⑮

绒褐是兰州名产。乾隆年间的记载称：“兰州生产绒褐名擅大装……由来久矣。”^⑯道光《皋兰县续志》记载：“皋兰纺织之利，古惟缉羊毛为线，织褐衣之功，作颇粗；乾隆初有绒褐之名，较诸毛褐为精，其尤精者姑绒。……客商来兰州收绒褐者，岁数万金。”^⑰乾隆中叶兰州、西宁所产“姑绒、褐子、毡片”也曾被官方收买，“雇车运赴巴里坤”，以备与哈萨克交易。^⑱光绪《皋兰县志》记言：“绒褐，细而有绒者为姑绒，无绒者为褐；尖细而薄者为平机褐，次则为粗褐，又次为牛毛褐，以牛毛织之，均

① 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76—77 页。

② 卢坤：《秦疆治略》，《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288 号，成文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30 页。

③ 《清史稿》卷 124《食货五·茶法》，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653 页。

④ 王沂：《青烟录》卷 8《食烟考》，转引自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 页。

⑤ 道光《皋兰县续志》卷 4《土产》，第 33 页；卷 3《水利·一条城水车之利》，第 10 页。

⑥ 道光《皋兰县续志》卷 3《学校·青城书院》，第 26—27 页。

⑦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 4《食货·物产》，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 16 页；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 3《食货·物产》，光绪十五年刻本，第 11 页。

⑧ 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 623 页。

⑨ 乾隆《庆阳府志》卷 13《物产》，乾隆二十六年刻本，第 4 页。

⑩ 乾隆《甘肅府志》卷 6《食货·物产》，乾隆四十四年刻本，第 29 页。

⑪ 道光《镇番县志》卷 3《赋役志·物产附》，道光五年刻本，第 8 页。

⑫ 道光《靖远县志》卷 5《物产》，道光十三年刻本，第 31 页。

⑬ 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1 期。

⑭ 卢坤：《秦疆治略》，《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288 号，第 30 页。

⑮ 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77 页。

⑯ 乾隆五十四年《绒行碑记》，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 281 页。

⑰ 道光《皋兰县续志》卷 4《土产》，第 33—34 页。

⑱ 《清朝文献通考》卷 33《市余考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164 页。

堪服用。……旧时业此者甚多，咸丰以来西洋布盛行，绒褐出售不易，店铺一概停歇。”^①

乾隆后期，因有机户、匠人偷工减料，“以粗陋短窄之料作弊货卖”，兰州绒行行首张锡、单宗传等与客商、机户等曾“整顿行规”，订立章程八条，并稟请官府“出示严禁”。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皋兰县令朱尔汉颁布告示：

查县属城乡织卖姑绒，从前定有丈尺，久经示谕。……近因该机户、匠人图利生巧，仍造不足丈尺粗陋之绒出售；竟有无知发货客人以及铺户人等亦生奸计，每匹不足之料数凡买绒之家必得添买成料。此等弊端断不可长，合行出示严禁。为此，仰城乡机户、匠人、铺家以及发货客商人等均知悉：自示之后，尔机户、匠人即行另改机器，织造加长姑绒每匹长九丈，常行绒长八丈二尺，均宽一尺四寸；□□□匹□长八丈二尺至九丈为数，宽一尺三寸。其价许照时值做售，该铺户、客商亦许挑买长大之料。倘该机户等□□□□□绒褐，商民铺户私行偷买者，许该行首人等查出指名，扭禀本县严行提究，决不稍宽。凛遵毋违，特示。^②

绒行所定章程八条如下：

一、每绒一匹，照旧长八丈二尺，宽一尺四寸；

一、加长绒长九丈，宽一尺四寸；

一、毛褐长八丈二尺，宽一尺□寸□□；

一、铺户希图渔利，将不遵式样之绒褐滥收滥卖者，罚银六十两；

一、机户将不遵式样之绒褐与铺户、客民□□□受者，两家各罚银六十两；

一、牙侩将不遵式样之绒褐卖与铺户、客民者，牙侩更换，铺户客民之罚□□□□□；

一、行首查出等[舞?]弊徇私者，罚银一百二十两；

一、机户收买绒线，仍买加毛不净之筒线参杂织造□□□□□□□□出，罚银三十两；倘铺户、牙侩徇情容隐者，牙侩更换，铺户照机户同罚。^③

药材是甘肃输出的又一重要商品。平凉府华亭县“药凡一百五十三种”，贵者如鹿茸、虎骨、麝香、黄精、何首乌、熊胆等；其次则龙骨、鹿角、霜地黄、南星、半夏、牛膝、胡黄连等。^④ 乾隆《庆阳府志》药产列有牡丹皮、芍药、甘草、枸杞子、鹿茸、肉苁蓉等 60 余种，^⑤其中，鹿茸、麝香、大黄、枸杞、琐阳、肉苁蓉等是甘肃著名药材。凉州府永昌县“药材甚夥，惟枸杞、大黄多且良，鹿茸、麝香、牛黄间有之”；^⑥镇番县“药有多种……多且良者枸杞、琐阳、青盐外，厥惟苁蓉”^⑦；兰州府靖远县亦产琐阳，“状如山药，粗细长短不等；……切片晒干充药用，云功力十倍肉苁蓉”。^⑧ 甘州府“土性之佳枸杞、大黄”；^⑨宁夏府中卫县所产枸杞最著，“宁安一带家种杞园，各省入药甘枸杞皆宁产也”。^⑩ 西宁府药产以红花最佳，而鹿茸较多；^⑪循化厅药产以鸡爪黄连最著。^⑫ 秦州直隶州药产有红花、白芨、黄精、紫苏等 80 多种，其中产量较多者有荆芥、苍术、黄芩、杜仲、甘草、羌活等十余种，而“最佳者半夏”；泰安

① 光绪《皋兰县志》卷 11《舆地下·物产》，光绪十八年刻本，第 56 页。

② 乾隆五十四年《绒行碑记》，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 281—282 页。

③ 乾隆五十四年《绒行碑记》，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第 282 页。

④ 嘉庆《华亭县志》不分卷《田赋第四·物产》，第 22 页。

⑤ 乾隆《庆阳府志》卷 13《物产》，乾隆二十六年刻本，第 3 页。

⑥ 嘉庆《永昌县志》卷 1《地理志·方产》，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第 10 页。

⑦ 道光《镇番县志》卷 3《赋役志·物产附》，第 8 页。

⑧ 道光《靖远县志》卷 5《物产》，第 30 页。

⑨ 乾隆《甘州府志》卷 6《食货·物产》，第 25 页。

⑩ 道光《中卫县志》卷 3《贡赋考·物产》，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 2 页。

⑪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 8《地理志·物产》，乾隆十二年刻本，第 4 页。

⑫ 乾隆《循化志》卷 7《物产》，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第 32 页。

县药材“多而货于远”者为知母、甘草、防风；徽县“药草多者百合，最佳者山药、何首乌”。^① 山陕商人经营药材业者兰州有“药材行”，^②武威有“药王会”；^③陕西省城西安是甘肃药材东运的重要中转地，乾隆年间已建有药材会馆。^④

以上笔者利用商人会馆碑刻等资料，对清代中叶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考察显示：武威的陕西商人主要来自关中的西安、同州二府，晋商来自平阳、汾州、太原等府和解、绛二直隶州，即晋中和晋南；秦州的晋商则主要来自晋中的汾州、平阳二府。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货主要有绸缎、布匹、茶叶、皮毛、杂货等，绸缎、棉布、棉花、茶叶等是甘肃输入的大宗商品，主要来自江浙、湖广与河南，汉口、洛阳、西安、泾阳等是内地商货销往甘肃的重要转运节点；水烟、药材、皮毛制品等是甘肃输出的主要商品，泾阳是西北皮毛、水烟转运内地的加工集散中心。

就目前所见资料，活跃在甘肃的山陕商人以兰州、武威两地最多，乾隆年间汇聚在兰州的山陕商号已有四五百家，武威更达六七百家。秦州和张掖的商人要少得多，秦州山西会馆创建之初只有商人商号二三十家，嘉庆时才增至 110 余家；张掖山西会馆虽然建于雍正初年，但直到同光之际商号数量也不过 50 余家。对捐款金额的分析显示：武威的商业规模可能超过省城兰州，兰州的山陕商号主要应是为本城居民服务的，其转销范围大体只涉及西宁府；武威商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批发中转为主，其商货转销范围不仅可达甘州、肃州、安西州，还远及新疆。张掖会馆重修之际武威商人曾鼎力相助，也反映了这两个城市密切的经济联系。武威是清代中叶甘肃最大的商业城市，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张掖、酒泉、敦煌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

Business Activities of Shanshan and Shaanxi Merchants in Gansu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Based on Inscriptions

Xu Tan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n the origin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of Shanxi and Shaanxi merchants in Gansu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by using the inscriptions in merchant guild hall and so on. The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most Shanxi merchants in Gansu came from Central Shanxi and Southern Shanxi, mainly distributed in Pingyang, Fenzhou and Haizhou. Shaanxi merchants mainly came from Xi'an and Tongzhou. The commodities operated by Shanxi and Shaanxi merchants in Gansu mainly included silk, cloth, tea, fur, groceries, etc. The bulk of Gansu's imported commodities were silk, cotton cloth and tea, while the output was hookah, medicinal materials, fur products, etc.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there were 400 - 500 Shanshan and Shaanxi firms in Lanzhou, 600 - 700 in Wuwei, and much fewer in Qinzhou and Zhangye. Wuwei, as the prefectural city of Liangzhou, w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hub connecting the Central Plains with western Gansu and even Xinjiang. Its commercial scale and hinterland may exceed the provincial capital Lanzhou.

Keywords: Shanxi and Shaanxi Merchants, Inscription, Lanzhou, Wuwei, Donation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 4《食货》，第 16、21、34 页。

② 光绪二年城隍庙“各行捐款碑”，碑存兰州城隍庙，笔者于 2019 年 9 月考察时拍摄。

③ 嘉庆二十五年《重绘陕西会馆新建卷棚、看台、土主神祠、钟鼓二楼、碑亭园亭题名功德碑记》，碑存武威市大云寺。

④ 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趋于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84 页。